

時間 | 2019 年 9 月 28 日(週六)

地點 |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館 25234 會議室

主持人 | 謝仕淵

講者 | 陳曉怡

主辦單位 |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教育部國教署人權教育資源中心

協辦單位 | 國家人權博物館、富邦文教基金會

謝仕淵：歡迎大家今天來參與我們這系列的工作坊的第一次上課，我是成大歷史系的謝仕淵。因為我們今天有來自四面八方的朋友，有來自澎湖的同學跟老師一起來討論我們今天所帶來的議題：「山東流亡學生與澎湖 713 事件七十週年」。今天主要的課程安排，是從這個已經在澎湖跟台北目前在展覽中的這個特展，分享我們在當初規劃的時候的想法跟內容。我們期待在這 3 次的工作坊之後，能夠 11 月在成大博物館展覽新的版本。它能夠再有一些，譬如說不同可能，這個不同可能到底是什麼？這個當然讓我們經過 3 次的討論才會知道。那我們今天第一天的工作坊的第一堂課，我們請了這一次展覽的策展人陳曉怡老師，來跟我們談一談這個展覽主要展示的內容，跟她主要把握的內容是什麼。我們用掌聲歡迎陳老師。

陳曉怡：謝老師、台下各位老師、同學早安。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可以來到這裡分享關於這次山東流亡學生與澎湖 713 事件七十週年特展的內容介紹。我覺得今天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意義非常的深刻，大家知道為什麼嗎？因為今天是教師節。而這個事件就是一群老師與學生交織而成的一個生命的故事，希望各位在讀過之後能夠會有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感覺。在一個動亂的環境當中，老師跟學生們是如何一路顛沛流離地艱辛地走過一段歷程。在開始之前，我想先引用十年前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曾經描述過一段山東學生的故事，她在最後就留下了這一段話，我覺得非常的發人省思。龍應台寫道：「很多殘酷來自不安。」這一群原本單純只是想要讀書的學生們，他們在懷抱著讀書的夢想，卻不知道為什麼闖進了一個對他們而言是一個殘酷的歷史。

故事的開始就是在 1949 年的夏天，有一群來自山東的流亡學生，他們從廣州搭船到了澎湖，被澎湖的防衛司令部所收容，而當時收容的條件是讓他們在這個地方，半天讀書、半天當兵來完成這個學業。但是結果就在到達之後的幾天，也就是 7 月 13 號，發生了一件因為強制編兵然後導致的 713 事件。甚至也因為這個事件，又延伸出來的另外一個匪諜案：兩位校長還有 5 名學生因為被誣陷為匪諜而遭到了軍法審判之後，被槍決。這事件也就是我們談到的，除了 713 事件之後延伸出來的山東流亡師生案。由於這個事件牽連的人數非常的廣，所以它也成為了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最為重要的冤案之一。我們一般對白色恐怖的認知好像多數是在二二八之後，然後因為進入戒嚴時期，許多本省人所遭遇到

的一個白色恐怖。可是實際上，它也可以當作是白色恐怖時期外省人的一個白恐經驗。

兩年前國家人權館委託了澎湖科大的林寶安教授，進行對山東流亡學生還有 713 事件資料的搜集調查和對當事人的口述的訪談，主要就是期望為白色恐怖的事件留下最貼近當事人的一個觀點，還有他們生命的一個記錄。由於今年剛好又是這個事件的七十週年紀念，也就有了我們這個展覽的一個產生。為了能夠清楚地勾勒整個事件，也配合就是我們搜集而來的相關的文物跟資料、林寶安教授還有各界的一些研究的資料，我們這個特展的架構將分為這 4 個單元，這 4 個單元從「為什麼流亡？」開始。流亡是為了學生們想要讀書。因為追求讀書的夢想，所以他們來到了澎湖。可是卻在澎湖這個地方，遇到了一個殘酷不安的狀況。而事件發生過後，當所有的事件似乎是結束的時候，因為家再也回不去了，他們也必須在異鄉落地生根，故鄉移成他鄉，而異鄉反而成為了他們一個真正的家園的情況。在第三個的部分我們要談的是所謂山東過台灣的一段歷程；最後我們以對真相的追尋、還有記憶的重構，這個地方畫下了句點。期望我們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內容讓我們留下了歷史的見證，同時也引發大家、社會對於這事件的關注。今日主要的這一個小時，我主要的目的其實就是要來為各位介紹我們當初規劃的這個特展的一個內容。

我們先從第一部分開始，學生為什麼要流亡？為的是其實就是讀書。其實我們可以想像，在一個兵荒馬亂的時代裡面，生存都已經很不容易了，為什麼還要讀書？可是在中國社會裡面，不管如何書就是一定要讀的，這其實是我們一個很傳統的觀念。而對於政府來說，所謂的教育也是「國之根本、百年大計」，為了讓學生能夠繼續受教育，就通令學校遷到所謂的大後方，也是我們知道的重慶。然後將學校編成聯中、或是聯大，讓學生都能夠到大後方繼續求學。所以當時流亡學生的一個產生，並不是只有山東流亡學生，在中日抗戰期間，流亡學生就已經產生了。各位如果有看過一本非常著名的小說《未央歌》，裡面描述的就是小童還有蘭燕梅他們這群西南聯大青春年少日子，在座的各位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事實上，雖然中日抗戰勝利了，可是苦難並沒有結束，因為國共內戰緊接而來。到了 1949 年初的時候，就打到了山東，所以當時山東已經是非常的危險了。而且最主要是隨著青島跟濟南這個幾個大都市相繼的淪陷，當地的百姓也開始遭受到共產黨的清算鬥爭。所以我們後來會發現，許多山東流亡學生的家庭背景都是不錯的，家中稍微有點資產，也有可能是地主階級。所以也就是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許多稍有資產的家庭認為小孩留在家鄉並不安全，家裏有機會遭到清算。同時他們又覺得讀書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儘管當時很多學校宣布停課了，但是仍然有一些非常熱心的校長、或是老師們，他們願意帶

著學生往南方走、四處去尋求幫助，所以許多的家長、父母，縱然捨不得，他們也會跟小孩子說：「沒有關係，你就跟著學校走。」一群才十幾歲的青少年、男孩女孩，就在父母的鼓勵之下出走家鄉。當然很多也是他們自己決定要這麼做，因為他們覺得不要留在家鄉。這一些學生因為有了這樣一個選擇，於是又踏上了一個流亡的路程。

我們也可以發現，流亡學生不是我們想像中的，一路上都是非常的愁眉苦臉。事實上，他們還頗能苦中作樂。像他們在很多地方，他們會以很有限的資源，去留下合影。而這些照片就成為我們了解他們這時候很重要的一個憑藉。像這張照片就是他們在湖南拍下來。湖南對他們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到了戰爭的末期，大多數的山東流亡學生其實都集中在湖南這個地區。然後他們事後再回想起來的時候，他們說，他們流亡到各地，不知道為什麼湖南人都對他們特別好。後來有一個湖南人對他們回應說：「我們為什麼對你們特別好？是因為我們的孩子也跟你們一樣，大多數都在外面。」湖南人是很會打仗當兵的，所以很多軍隊其實都是湖南人。這些有子女的湖南人，在看到這些小孩子的時候，他們也會覺得格外親切，會格外地給予照顧。

這些跟著學校走的學生，當然也不是這盲目地亂走。事實上，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跟山東教育廳，也在浙江還有湖南的這兩個地方的主要鐵路沿線，重點在鐵路沿線。為什麼要在鐵路沿線？我猜測是因為要走的時候比較方便。他們在鐵路沿線，設置了許多臨時中學來安置學生。當然這個都是因應情勢，且戰且走。

其實我在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其實我的第一個想法，我跳出來的第一個東西是什麼？大家很難想像，竟然就是草鞋。其實如果大家有讀過很多人在描寫他們在抗戰或者是逃難的過程當中，他們常常會提到他們穿著草鞋在流浪的這個過程。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對我個人而言，草鞋對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因為我爸爸告訴我當年在家鄉，我們家就是做草鞋代工生意的。大家很難想像說原來草鞋也是個，就像今天一樣，是一個代工、加工廠。把很多的草繩批出去，地方商人就會挑著做好、編好的草鞋，一籠一籠的就是交過來工廠這樣子。所以這時候我想到說，草鞋其實可以代表一個移動的象徵，鞋子代表著移動。事實上、當時並不是說這群學生從一開始就是穿著草鞋。其實人很多描述，一開始說都是穿著家裏買的鞋，甚至有人穿的是當時中國年輕人最喜歡的鞋子，叫做「回力球鞋」。可是在流亡的途中，就沒有錢再買鞋了。鞋子破了，又沒有錢，可以怎麼辦？其實他們身上有著另外一雙鞋，常常都是母親在離家之前縫給他們的鞋子，母親就說：鞋子壞了，你就穿上這雙鞋子。可是，問題就在這群孩子當他們踏上流亡的路程，他們其實已經知道，越向前走就離家越遠。那麼，想要跟母親再相見已經更加的不可能。所以他們很多時候其實

都捨不得穿這雙棉鞋的。於是，他們最後就只好跟著大多數的士兵一樣，穿著自己編織的草鞋。而這些學生還不會編草鞋。他們常常可能會用其他的方式，有些人學著編；有些人就會跟很多不識字的這些士兵們說：「我幫你們寫信，你幫我編草鞋。」草鞋就在我們這一次的展覽當中，成為一個蠻重要的元素，它成為一個流亡、一個移動、一個離開到異地的一個象徵。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可以從這次的文物當中，發現有非常多是屬於他們的學生證，不管是臨時發的，或者是什麼的。這些學生證千辛萬苦地被保存下來，在這樣子的一個顛沛流離的環境當中，他們竟然還把這些東西保存下來。我們之所以保存某種東西，就在於我們對這個東西的一個價值跟意義的肯定。從這當中，我們可以看見他們對於學生證的重視。這也是在流亡途中的一個蠻重要的點。

其次，當越來越多的難民、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往南方前進的時候，同時又加上這個時候戰況越加的困難，因為共產黨這個時候已經渡江了。所以各校也接收到命令說遷到湖南或是江西。可是，這一群當初超過 1 萬多名的學生，他們要如何抵達目的地，是途中最艱鉅的考驗。今天我們看到很多的流亡學生，在他們的回憶當中，坐在火車頂上，或是搶搭最後一列火車，就是他們最深刻的一個流亡經驗。我在這個地方找到的兩張照片，一個是當時他們搭乘的這個粵漢鐵路的火車。這輛火車，它的頂部不是平的，是圓弧狀，所以是很難坐人。有一位叫冉亦文的當事人，他留下的描述是說：「事實上人很多，他們根本擠不進去，根本擠不進去這個車廂。」所以，大多數高大的學生爬上去，然後他們再把其他同學，一個一個這樣的拉上去。可是拉上去之後其實並不好坐，我旁邊找的這張照片可能不是很符合，因為它頂部至少還是平的還好坐。可是實際上山東流亡學生他們當時所搭乘的火車，因為是圓弧狀，所以他們必須要怎麼坐？他們必須要坐在行李上，兩排的人背靠背著，然後每一個人要手拉著手，就好像互相這樣子拉著才不會掉下去。當時就有些人記錄是說當時還是有人掉下去摔死了。可是，我也看到不一樣的說法。因為這個火車載重量實在太大了，所以走得非常的慢，慢到就算是掉下去了，你還是可以再爬上來。所以，這些的記錄其實都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流亡學生在這一段期間裡，他們所經歷過一個無法想像的狀況。

這樣一路的遷徙，走到了粵漢鐵路上的一個小站，其實很多人都已經走不下去了。這個小站叫棲風渡。棲風渡很有名，因為它也在龍應台的書中出現。雖然棲風渡算是一個小站，可是它是南來北往的火車都會經過的小站。所以當時很多的流亡學生在這個地方，他們開始猶豫了，因為已經越走越遠了。他們有些想說，未來到底能不能夠期望？這樣一走，離家鄉越來越遠了。所以就在到底要搭上南下的列車還是要搭上北上的列車，很多人都在這個地方猶豫不決。這麼小小的一個年紀，就要決定人生的未來，你究竟要搭上哪一輛的列車？你搭上那輛列車，你的人生可能從此就截然不同。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故事是關於張

玉法。張玉法是台灣著名的中研院的學者，當時他大概是 14 歲。他的二哥比他大三歲，把他拉到一邊說：「我們兩個不要同時搭上南下的、同時搭上一輛車。這樣子我們的命運，萬一兩人都完了的話，父母都沒指望了。」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17 歲的少年，第一個想到不是說：「啊我萬一死了怎麼辦。」他想到的是父母就沒了指望。所以他二哥當下就決定，跟張玉法說：「你南下，我北上。我再去投考軍校，去投靠孫立人的部隊。」於是他們就在這個地方，張玉法看著他的哥哥上了北上的列車。可是，過了幾十年之後，張玉法成為了台灣中研院的歷史學者。而他才知道他的哥哥並沒有達到長沙，也沒有去報考孫立人的部隊。因為他在途中就被另外一支軍隊給抓走了。抓走了之後，又被帶到了雲南，跟雲南的部隊作戰。之後，又被雲南部隊給俘虜了，變成這個部隊的士兵。然後，再跟共產黨的解放軍交戰之後，他又被解放軍俘虜了，於是加入了解放軍。但是最終因為他是地主的兒子，所以他回到了家鄉。張玉法也後來才知道，他二哥就此當了一輩子的農民。就在一個火車站裡，兩個兄弟的命運就截然不同了。

不只學生這樣子的擔心究竟要南下還是北上。事實上，當時帶領著這些學生、肩負著這些學生未來、把他們帶出來的老師跟校長，他們其實更加的頭痛是因為，當時戰爭越來越吃緊了，政府其實也沒有經費、沒有辦法再管他們了。到底他們會想說：「我究竟要把學生帶到哪裡？」當時整個中國大陸幾乎已經沒有一個地方不是戰火綿延。哪個地方才是安身立命的地方？最終他們決定：隔著一個海岸的台灣。他們認為這才是他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只是當時的台灣，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容易來，因為當時基於安全上的一個理由，並不是想來就可以來的。所以，其實這一群的學生，也可以說是幸運的。因為有他們的老師跟校長，也有他們所謂山東省主席韓旋跟協商，最後可以用特例處理，然後讓同樣是山東人，當時在澎湖防衛司令部擔任司令的李振清來收容編訓。

事實上翻開這段流亡學生史，真的就只有山東流亡學生？其實還有一批叫河南流亡學生。我的同學的父親就是河南流亡學生。他曾經在跟我說這段事的時候，說他爸爸在河南的時候遇到山東學生，然後他爸爸就開始吹噓他如何的英勇，然後去抗議，再搶上了最後一輛的火車離開杭州了。可是，有趣的是我在山東流亡學生的日記裡面看見這一段話：「這群河南學生真是太可惡了，他們竟然用暴力搶走了最後的一輛火車。」後來我把這段文字印下來，就給我同學看。他說：「真的我爸會是這樣子嗎？」我們從這一些經驗裡，可以更生動地去感受到他們當時流亡的狀況。後來河南的流亡學生沒有像山東的這麼幸運。他們最終是各自的打散走了。我同學的爸爸面臨一個抉擇，就是他們幾個同學逃到了越南的邊界，然後兩個同學都不會游泳，只有他爸爸會游泳。他爸爸的抉擇是要背這個同學、還是背那個同學渡過河去。我忘記了他背哪個同學，總

之他們到了越南，在那個地方待了三年，最後才回到台灣。這又是另外一個故事的開始。

這群學生就在老師們還有許多人的協助之下，他們南下到了廣州。到了廣州之後，他們等待著要上澎湖航行的船。對他們來講這時候他們的心情算是比較輕鬆了。所以我們看到了非常多的照片是他們在廣州留下來。而且他們很有趣，他們都會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前合影。我猜想可能同樣都是年輕人，會對於這樣子的故事有一個嚮往。雖然說他們知道自己可能可以去台灣，可是在棲風渡發生的狀況，同樣再發生了。也就是說，很多人開始猶豫了：我到底要上船，還是留在這個地方？我曾經聽過一個老先生他跟我說，他當時就這樣上船又下船、下船又上船，然後就這樣上上下下很多次，然後最終他還是上了船來著。同樣的狀況，也有姐妹跟張玉法的情況是一樣，姐姐上了船，妹妹留在那裡。這樣子的狀況在當時是非常多的。雖然他們充滿了希望來到廣州，可是他們也是對未來是有點茫然。就在忐忑不安的這個狀況之下，這一批超過了五千多名學生就分成了兩艘軍艦來到了澎湖。只是他們並不知道，迎接他們的是我們剛才說的一個殘酷的未來，因為在這裡發生了「澎湖 713 事件」與「山東流亡師生案」。

當時他們上了岸之後，原本依照教育部的訓令是應該當時的澎防部將十七歲以上的少年編入青年教育總隊，也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一半時間讀書、一半時間當兵」。其餘比較年幼的、或是體格比較矮小的、還有女生，就進入了澎防部的子弟學校就讀。

學生們原以為來到這裏，好像也都這樣子定案了，應該可以完成學業了。沒想到就在幾天之後，情況就逆轉了。因為澎防部違反了當初的承諾，把他們從青年教育總隊改編為一般的軍隊，而且還把未滿十七歲的學生也進行了強制編兵，於是就引爆了所謂的「713 事件」。這個「713 事件」其實就是當學生們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非常不滿，他們天真的以為他們只要抽出營區（他們當時是住在那個營區裡），然後回到學校就可以自由了、就可以讀書了。他們非常的單純和天真。可是，一出了營房，到了大操場，四周全是士兵，而且士兵就立刻進行了點名跟編兵。當時主要有兩個比較大一點的學生，憤而上前去理論，卻被士兵的刺刀所傷。學生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子的情況，當下每一個人都愣住了。軍方就在這樣子一個強勢政策之下，開始進行了編兵，把所有他們認為身高年齡體重可以的就編去當兵。有人傳說，用一把槍立起來，然後跟槍比一比高度來作為編兵準則。我爸爸說他當時從浙江過來、在基隆上岸的時候，也是這樣狀況。我爸爸很幸運的是，當時軍隊裡面有一個我爺爺認識的朋友就說：「這個是我的親戚。」就把他從那條隊伍裡面拉出來。沒想到我爸最後成為軍人，有時候我們說人的命運也是注定好的。

後來這個就是成為了我們所謂的這個澎湖的「713 事件」。分編之後，他們自己嘲笑自己說：「他們從丘九變成了丘八。」丘八是士兵；丘九就是學生。當時丘九比丘八的地位是要大一點，因為中國人是尊敬學生，所以他們在流亡途中是受到很多人的禮遇。可是在澎湖，他們本來以為是可以來讀書，可是他們卻一夕之間全部被剃了頭、穿上了草綠色的制服，然後成為了士兵。對於學生來講，有許多人就因此產生了不滿。他們覺得說：「我明明是來讀書，為什麼你把我編兵？」所以就產生了許多的怨言跟抱怨，這些怨言跟抱怨就傳到軍方那邊。軍方於是開始進行了思想整肅，也就是對那種會常常去抱怨，或者表達不滿的學生，開始進行拘捕或關押。很多的學生回應說他們也常常感覺到許多同學在半夜，忽然就不見了。

除了學生的部分之外，師長們其實更是生氣。他們認為說：「我千辛萬苦地把這一些學生帶出來、擔負著這些學生父母的期望，那你們怎麼可以違反承諾？對他們進行編兵？」所以這些師長就向澎防部、軍方抗議，於是就形成了跟軍方之間一個緊張的關係，也種下了日後他們被誣陷為匪諜的一個因子。當時裡面其中有兩位校長，一位就是今天我們比較知道的張敏之校長。張敏之校長其實是一個非常忠誠的國民黨員，他也認識許多算是我們所謂的高層人士。所以他一方面積極地鼓勵不滿 16 歲的學生讀書，同時也積極地寫信去為學生奔走。還有另外一位校長鄒鑑，他就跑到台灣來，希望能夠求援。我們找到張敏之友人的日記裡面看到，他記錄了這件事：「七月二十九，張敏之所帶的學生被迫從軍。九月六號，張想要從澎湖到台北。」結果張敏之是無法來到台灣，因為他在澎湖就被捕了；鄒鑑也隨之被捕。這些人被捕的理由都是因為匪諜。我們知道國共勢不兩立的時代，匪諜大概是最使人聞之色變的一個字眼。當時防衛司令李振清他們說：澎湖是有匪諜的。台灣當局就會相當緊張，非常重視。他的部下陳復生更理所當然地誣陷這些會積極求援，或是表達不滿的老師、校長或是學生們，利用各種言行逼迫他們承認自己是匪諜，甚至還幫他們畫了組織表，說他們是共產黨的什麼什麼。有些人表示自己從來沒有加入共產黨，但是就在那樣的狀況之下，他們全部因為言行被迫承認。這樣子的一個匪諜案，成為日後的冤獄案。張敏之先生當時在獄中的留書描述了，除了學生被逼嚴刑之外，他也被捕遭到酷刑，然後而且被捏造口供，強迫他簽字承認他是匪諜。有一位流亡學生在他後來出版的一本書《歷史的烙印》裡面提及，張敏之用一首詩來描述當時他們所遭遇到的刑罰：

「身在牆前臂在後
雙手反綁墜石頭
石割兩肋鮮血流
三八刺刀腿上抽」

這個景象在我們民主自由時代，真的是非常難以想像。就在非常短的時間之內，臺灣省的保安司令部就進行了軍法的審判。在審判書上可以看到就是：張敏之校長等 7 人，就是包括 5 個學生，意圖利用非法的方式顛覆國家。這條罪名就足夠大到讓這 7 個人在十二月的時候就被槍決。被槍決的隔天，報紙當然也就大幅報導，他們的標題就是：「你們逃不掉的 昨續槍決匪諜七名」。可是在當時是有一部分人知道這個事件是被誣陷的。所以到了 1953 年，有一些人士開始出來。雖然這些人已經被槍決了，但是他們仍然認為這個案子要必須被重審。所以當時就有一個國代，像談明華，他就開始寫給蔣中正的一個報告書當中，他說：是應該要准予「昭雪冤獄」，然後來撫卹遺囑來以激勵人心。雖然案件有重審，但是卻沒有能夠為他們重新平反。

雖然說這些學生被編兵了，校長也被槍決了，可是到了 1955 年，這些被編兵的學生隨著部隊移防到台灣之後，他們的想法是：「我現在當了兵，也到台灣，我總該可以退伍復學了吧？」可是沒有想到事與願違，所以他們又再一次決定要為自己爭取復學的機會。他們就在這一年的 4 月 16 號，決定集體請假離營，然後北上請願。可是就在台中火車站，他們遭到了阻礙。他們最後的一個做法是「不用暴力、全部圍坐在蔣中正銅像前面、用靜坐來抗議」可惜，當局並沒有接受他們這樣的抗議，而且還在後幾天就逮捕了領導參加的 39 名學生，他們關了一陣子，後來才被放出來。這個也是等於一個餘波盪漾下的一個「台中市 425 事件」。

這個地方其實有一段當事人談「713 事件」，是一位叫做黃端禮的老先生。我非常敬佩的這位老先生，今年我想他應該已經 90 歲了吧。他在過去那些年不斷地為這件事情提出他自己個人當時的所見所聞。當然他說龍應台都錯了，李敖也錯了，誰誰誰也都錯了。因為他說「只有我在當時，我親眼看到。」我在這地方我可以感覺到一種浪漫的，這浪漫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就算別人不相信他，即便已經是垂垂老矣，他仍然要爭取他自己所認為的一個真相。他出了很多的書，然後他常常寫信去跟國史館抗議。他不斷地寫各種陳情表找資料、上網站去找各種的文獻，甚至建立了部落格、臉書，無一不在傳遞他自己、我們可以說無論他所說的真相是不是百分百的遵照，我們其實都為他堅持追求真相的一個決心而感動。

到第三個部分就是我們終將要回歸平凡的一個生活。這些曾經漂離的流亡學生，他們也必須要在這個地方努力讀書，然後成家立業，才能夠反撲那個漂泊的命運。在第三部分裡面，其實主要想要呈現的是這一群山東過台灣的生命經驗，而他們也就成為了所謂的山東的一個的開臺始祖。我們說他們從山東出走的那一刻，其實故鄉就是他鄉了。當他們在這個地方落地生根之後，他鄉反成了自己的故園。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一群共同的命運。他們在這個地方，仍然

堅持的去完成他們的學業。當然比較幸運的是能夠在澎湖就進入澎防部子弟學校讀書的。這個地方設備非常簡陋，教室就是他們的寢室。他們也沒有什麼教科書，教科書是輪流使用的；也沒有什麼文房四寶，常常就是用一塊板子，用石頭這樣在上面寫字；有時候是站著、有時候是坐著。到了晚上就把這些通通挪開，然後就是他們睡覺的地方。不過他們其實也有各式各樣的活動，仍然會組織籃球隊、舞蹈隊，就像今天學生一樣。到了 1952 年的時候，因為當時的代理校長苑覺非覺得在澎湖這個地方真的太辛苦了，因為所有的補給都必須要從台灣運過去。而且學生接下來遇到的畢業，畢業後的求學，又是一個困難。所以他一直跟教育部申請希望能夠讓學生到台灣來讀書。而教育部也終於在 1952 年在員林成立了特設的實驗中學，讓這一群學生們來到台灣就讀。相對而言他們是一群比較幸運的學生了。除了受難者之外，其他被當兵的學生，他們其實也不是真的就這樣接受命運。很多人其實也是努力的考上：譬如說三軍的官校。像當時我小時候的一些伯伯叔叔，他們就是山東流亡學生。有些人他們去報考了空軍官校，後來成為飛官。他們努力去報考軍校，也有些人在來到台灣之後，退伍復學了，再進入了員林實中，或者是到花蓮師範中學去讀書。事實上許多山東流亡學生其實都在教育界服務。

除了立業之外，當然很重要的就是我們說的成家，畢竟老師和同學再如何的關係緊密，再如何的有非常多的溫暖，其實是不如一個家的。所以很多人逐漸開始立業了之後，就開始成家。這種成了家之後，落地生根，等於說是承認他們真正的在台灣深刻地紮了根。紮根之後，對他們來說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願望就是希望能夠回故鄉看看。

當初很多人都說，當初父母在離家前告訴他的時候就說：「沒關係，你出去讀書，記得放假的時候回來。」這個「假」一放就是 40 年。40 年之後，也就是 1987 年之後，政府開放兩岸探親。他們才終於回到家鄉，等他們回到家鄉的時候，父母親早已經過世了。我們就會發現，為什麼很多的外省人回到家鄉之後要花那麼多的錢去修很多的墳墓。事實上修墳墓對他們而言是一種遺憾、一種表達唯一的彌補的方式，就是希望能夠為父母盡最後一份心力，那對他們來說是重要的。

在第四個單元裡面，我們也會想要在這部分來了解一下，作為山東學生的第二代，他們如何去看自己的爸爸媽媽。我們用「爸爸媽媽」是因為，流亡學生其實還蠻多女生的。我姐姐同學的父母，他們就是山東流亡學生。女生是千金小姐，男生是家裏長工的兒子。可是當時他們都成了流亡學生，跟著學校出來了。然後竟然在台灣，雖然當時身分是有一點點不一樣，可是到了台灣也感覺到，好像總是多一份親切的感情。後來他們就結婚了，好像聽說這位先生也對太太非常好。這些子女們要如何理解他們的父母？他們成長之後就會開始去追

問，並且去理解他們爸爸媽媽如何成為他們堅強的守護者，他們自己如何的去敘說這樣的一個故事。我們就從對一些流亡學生第二代的訪談記錄當中，整理歸納出來了 3 個面向。第一個，他們一定會說到的就是他們與老師跟同學之間的情感。這句話是我聽到一位老先生說的，我覺得這句話很讓我感動。他說：「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有時候所謂的兄弟，不一定都是要有血緣關係的，像這個很早就失去父親的第二代，他說，其實他爸爸很早就過世了。然後他爸爸過世的頭七剛好是除夕，除了他爸爸的同學之外，沒有人到他們的家裏來幫忙。因為除夕，大家都覺得觸霉頭。可是只有他爸爸的同學來幫忙他。所以成長的過程中，這些伯伯叔叔們真的就好像他的家屬一樣。另外，當時澎湖代理校長苑覺非的兒子苑舉正，他也回憶說，他爸爸的學生圍著他爸爸，就好像今天粉絲圍著周杰倫一樣。他說常常每天都會有學生來找他爸爸聊天，他有時候會覺得他自己跟他媽媽被晾在一邊，因為他爸爸跟學生的感情非常的好。他覺得他爸爸是好像活的祖宗台位一樣，為這些學生做了大大小小很多的事情。而且最特別的是他當了 200 多場婚禮的主婚人，就等於是組織了兩百多個子女的婚禮，這個真是非常的特別。除此之外，這個所謂「713 事件」對他們來說，當然影響非常的大。像陳芸娟就描述當時她的爸爸要返鄉探親的時候，感覺像是慷慨赴死。她爸交代說如果被抓，你要去找誰求救。的確，其實當時有人，因為在未開放之前就回去，他們都會留下遺書說如果怎麼樣了，就怎麼樣怎麼樣。事實上也就「713 事件」日後的一個影響。剛才提到的苑舉正，他也有提及，他說他的父親常常在喝醉酒之後大吼，說他其實這麼樣的忠貞愛國，為什麼他的這些朋友、這些學生會遭遇到這麼痛苦難堪的事情。苑舉正後來才知道，他們這一些人，即便時移事往、事過境遷之後，仍然擺脫不掉白色恐怖的陰霾。也就是因為對於第二代來說也是很特殊的經歷，會讓他們更加的在意、更加的想要去理解爸爸的故事。張文竹就說，因為她爸爸的早逝，所以她更想要去瞭解他的爸爸。她說：「我要去找 17 歲的他。」而她找到的其實不只是她爸爸，她說也找到她自己。她認為她自己人生的前半部是她爸爸所給予的，她是山東煙台人。那是她生命的起源。可是她說，她的婚姻讓她成為了臺南媳婦，她也覺得她更必須對這塊土地重新的理解跟詮釋，所以她覺得在這一段追尋父親生命往事的過程當中，她更加的告訴自己，她不能忘記自己是誰，她用這樣子的方式來教導她的子女。這個是我們對於第二代所整理出來的，他們對於父親的理解。

當然，事件終於要落幕了，可是曲終人未必散。我們對於真相的追尋、對於記憶的重建，仍然是相當重要的。雖然對於許多受難者而言，日後他們幸運地出獄了繼續的生活，但是痛苦並沒有結束。他們身心也因為受到極大的影響，很多人都會做夢，甚至成為一個噤聲者。這我感受到非常明顯，像我知道我的朋友的爸爸是山東流亡學生之後，我提出訪問的請求。他起先說好，之後就沒消息了。我沒有再繼續追問他，我猜測或許他的父親到如今也仍然不願意說。事

實上隨著台灣社會的解嚴，很多人也開始要努力地追求自己所謂的正義。所以在 1980 年代開始，許多人都積極的努力希望能夠透過各種管道來為這個案件平反。當然在 1999 年終於通過<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對許多的受難者或家屬而言，條例通過的意義其實不在金錢的賠償，而是對公理對正義的追尋。我想這個例子大概就是以張敏之校長的家人來看。他們之前出版一本《十字架上的校長》，近期他們的母親王培五女士雖然過世了，但是也仍然留下了一本《一甲子的未亡人》。我想可以讓大家更對這個事情有所了解。除此之外，大概從 1975 年、民國 60 幾年開始，有一個山東人創辦的雜誌。因為當時的同鄉會都會辦這種雜誌，一方面是聯絡同鄉的情感，一方面也是想要保存所謂的山東文化。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看到 1977 年《山東文獻》就在他們的雜誌上登出一則公告：「徵求流亡學生史料」。當然這沒有說是徵求「713」史料，他徵求的流亡學生史料。可是流亡學生的史料當中，必然就有關於 713 與山東師生案的許多事件描述。所以我們可以說，大概有將近 200 多期的刊物裡面，他們其實就在那樣子的情況之下，成為公眾可以公開討論的一個園地。除了這個雜誌之外，還有更多的受難當事人，企圖透過自我書寫來抒發自己的感懷，同時也希望用一己之力來還原真相。像我剛才提到的那位黃端禮先生，或者在各自的書寫當中。他們所描述的面向不同，但是他們所融會交流出來的其實就是這一群人在大時代裡的一個生命經歷。我們可以看到這裡面有非常多的書，包括著名的文學作者張放，她也留下了非常多的作品。同時《山東文獻》社他們自己也出版了一系列的山東人在台灣的套書。我特別介紹一下《從二等兵到教授馬忠良回憶錄》這書。這位流亡學生後來成為成大的文學院院長，還有學務長。他也是一位後來從二等兵變成學者的一個很重要的代表人物。我們說個人經歷當然會有所落差，而且在所謂的後真相時代裡面，真相也許難以重現。可是隨著社會解嚴，我們當這個世界成為可以討論一個人權議題的時候，許多來自外部的聲音，還有這些少數透過自我書寫，來傳播記憶的當事人，能不能夠召喚出更多聲音，還有對話的空間呢？我想「前事不忘，後事之師。」1949 年的大遷徙，它不僅是一群人的流亡記憶，它也對台灣社會影響非常深遠。那也如同前面龍應台所說的：「很多的殘酷來自不安。」這些以維護國家而形成白色恐怖時期裡面的被封印的往事，其實更應該隨著時代的開放，重新的被認知與討論。在一時之故，我們說發生在澎湖的「713 事件」，還有「山東流亡學生師生案」。

今年剛好是 70 年，我們都希望能夠在這個重要的時刻裡面，國家人權館在籌備這項特展時，能夠期待藉由這樣的一個展覽，開啟更多的對話跟交流，而社會或許也有可能因為這種理解而有寬容的可能。以上就是我對於這項展覽的一個腳本內容的介紹，謝謝大家的聆聽，謝謝！

(嚴慧詩整理；顏瑋洋審閱)